

古典文献研究論叢

北京大學出版社

古典文献研究论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古文献研究所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献研究论丛/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

ISBN 7-301-02766-4

I. 古… II. 北… III. ①古文献学—研究—文集
②古籍—研究—文集 IV. G256.1-53

书 名：古典文献研究论丛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2766-4/G · 28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银祥福利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5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9.5 元

说 明

本论丛主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的青年教员和研究生近几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大多是参加《全宋诗》编纂工作中的收获，也有教学、研究及攻读学位的心得。其中有年谱编撰、版本整理、事迹考辨、名著解题，丛札小考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搜集资料，考核辨析，论证具体，力求翔实。现在编辑成集，贡献于世，或有可取，仅供参考，更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

陈新先生在主编《全宋诗》中撰写了《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帮助年轻同志认识和处理四库本宋集及有关资料。现征得他的同意，在本论丛发表，以飨读者，以志感谢。

本论丛的编印，得到高校古委会秘书处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大力支持，谨在此深致谢意。

目 录

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	陈 新 (1)
四库提要中的失误	陈 新 (14)
《诗经》流传日本考	顾歆艺 (17)
屈原《九歌》解题	王丽萍 (33)
唐宋《宫词》版本考及其辨伪	刘 瑛 (37)
宋初九僧从考	许红霞 (50)
张咏年谱	王 岚 (78)
胡寅年谱及诗系年	马辛民 (134)
略论宋王庭珪《卢溪集》	吴 鸥 (174)
欧阳修西京交游及事迹考	刘 宁 (182)
孙觌生平事迹及其文集版本考	陈晓兰 (187)
项安世生平、诗作考	张弘泓 (219)
洪适诗作考略	康笑菲 (234)
宋代题画诗初探	李 更 (256)
清代古籍题跋研究	陈 捷 (283)

宋诗丛札

寇准《春恨》乃唐人诗	晁端友的生卒年
王邻臣的生卒年	康卫与康位非一人
“葛通议”即葛密	“陈诜”与“陈侁” 吴 鸥 (316)
王砺诗误作王洙诗	向宗旦任职广东时间
赵挺之名下误收吕仲甫诗	赵令松误作赵令穰
需禅师即释有需	《宋诗纪事补遗》

- 及《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引书之误 陈 捷 (321)
刁约的生卒年 毕世长字非“从古”、
“夷仲” 许红霞 (324)
王言彻误作王彻 曾会《捣砧词》为龚宗
元所作 《游文潞公曲水园》作者为贾昌朝 刘 佳 (325)
《君山》、《虎丘》作者王硕考
《题长兴吴城》作者邵緝志疑
袁点字“思与” 姚祜与姚祐 李 更 (327)
晁端彦事迹辨误 秦靓生平考 陈晓兰 (331)
马咸、马诚、马城辨 胡兰江 (334)
张唐英卒年考 赵成伯通判密州考
赵成伯生年考 赵成伯与赵庾疑为一人
《皇子生献诗》为蔡挺作 宁德伟 (337)
白雪楼与白云楼 萧永凤 (340)
王伸、王绅辨 顾永新 (341)
《宋诗纪事续补》纠谬一则 吕滇雯 (344)

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

陈 新

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收书三千五百〇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卷，是我国今存最大的一部丛书。丛书完成后，除各书前的提要另辑成书有较多影响外，全书当时虽有允许士子借阅的规定，真正能接触的读者极有限。即使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亦因受当时严肃的学者如鲁迅先生等的抨击，因此为学术界所忽视。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本全部影印出版，才获得相对的普及。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大有类似《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之势。这样庞大的书籍，个人毕其生恐怕尚难全部通读，要对之作出正确、科学、全面的估价，实属不易。事实上，书中的各个集子质量不齐，既有谨严的，也有草率的。所以虽然不该把它奉为圭臬，如鲁迅所讥评的：“现在中西方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也不应因先入之见，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正确的态度，自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对待。

今天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一般仍沿袭三十年代学者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如《辞海》的《四库全书》条目：

……内容极为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起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其编纂目的，在于宣扬有利于清王朝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图书，对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著作，多实施抽毁或窜改，以

至排斥不录，并加禁毁。

《辞源》相应的条目为：

……纂修时乾隆从维护清王朝统治出发，以宣扬封建教化为宗旨，寓禁于征，对不利于其统治的著作，或销毁，或命馆臣恣意篡改。抄校时也多讹夺。

“多讹夺”，是事实，清人张之洞《潘侍郎藤阴书室勘书图歌图为无锡秦谊亭作》诗中也说：“乾隆四库求遗书，微闻写官多鲁鱼。”但这只在一部分集子中有此现象，不宜以偏概全。“多篡改”，甚至多刊落，也是事实。但从影印的文渊阁本可以获知，这现象发生在纂辑的中后期，发凡创例时应该是相当严谨忠实的。如果说纂辑宗旨的目的就是“寓禁于征”，就是要篡改，就是“在于宣扬有利于清王朝统治”，不仅不合实际，而且基本上已经否定了全书。

笔者近年来因参与《全宋诗》编纂，较多的接触了《四库全书》中的宋人别集。深刻体会到此书对今天整理宋代文献的价值，同时认为，研究《四库全书》，进而作出比较正确的估价，恐怕也只能如此分门别类地进行。因此愿意把阅读所得写下来，期望能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此书抛砖引玉。

整理宋代文献的重要依据

《四库全书》收有宋人别集近四百种，其中本集当时已经散失，由四库馆臣根据《永乐大典》辑集成书的，约占三分之一。自《永乐大典》不幸被毁，这部分文献已成为天壤间仅存的瑰宝。因此它保存古代文化的价值，不言可喻。而且《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都是所谓的内府秘籍，一般人极难寓目。偶有抄手传出，在当时已弥足珍贵。今存宋人集中的一部分本子不明其源，实际大多祖出《四库全书》，试以谢逸《溪堂集》为例作剖析。

谢逸，北宋人，与从弟谢薖并称“二谢”，为江西派中著名诗

人，以咏蝴蝶诗知名，人称谢蝴蝶。其著作《溪堂集》已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成五卷。今天容易获见的是民国南昌退庐刊本，其书错讹脱漏严重，编者虽多方校订，大多不过以妄易妄，主要缺陷有：

一、刊本所据的抄本卷一已佚，因此把卷二分作两卷，以补足全书五卷之数。

二、卷一《三益斋诗》有目无文，其诗亦见谢集。

三、卷二《伤徐文学》“白发照青衫，奄忽死中路。功名安在哉，竟以儒冠误。去就各有时，寿夭亦无据”六句，刊本夺“中路”始一行二十字，遂成“白发照青衫，奄忽死无据”二句；《中秋与二三子赏月分韵得中字》诗，仅残存四行行首的“雨”、“雁”、“吐”、“裳曲”五字；《寄洪驹父戏效其体》诗全夺，并夺下一首《寄徐师川戏效其体》的诗题，驯致张冠李戴。

四、卷三《雪》，夺末二句“踏雪观梅亦不恶，月夜西楼更清绝”；《代送柳权郡》，夺中二句“皂盖双旌别汝江，去作他邦民父母”。

今北京图书馆藏有清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溪堂集》。鲍氏系乾隆时人，著名藏书家，其书自然即据《四库全书》录出，因此文字与文渊阁本相近，且无残缺；但《伤徐文学》《寄洪驹父戏效其体》《代送柳权郡》三诗的讹夺，亦与退庐刊本同。此外，抄本还多出《墨梅》二首：

朝见一枝吐，暮吟疏影寒。

亭亭不解语，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似林逋鬼，千年万年作知己。

孤山忆有咏残枝，洗尽铅华对寒水。

其出处见今存残本《永乐大典》卷二八一三。退庐刊本亦收此二首，但误连成一首。

以上事例，反映了退庐刊本所据是辗转传抄的鲍氏抄本，编

者见不到四库祖本，连鲍氏抄本亦未尝获覩。此例多少已能说明《四库全书》保存宋代文献的功绩。

无庸讳言，四库宋人别集辑本存在多方面的缺陷。最明显的是辑集的材料窄，基本上仅注意到《永乐大典》。就是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收有一百五十七家诗人的《两宋名贤小集》，为四库提要评为“然编诗之人虽出赝托，而所编之诗则非赝托，宋人遗稿颇借是以荟粹，其搜罗亦不谓无功”的，亦不入收辑范围。仍以《溪堂集》为例，四库《两宋名贤小集》卷三十《溪堂集》有《正觉寺》五言十一韵，《明水寺》五言二十二韵，《北津渡》七绝，《闺恨》五言五韵，《铁柱观》七言七韵，《绝句二首》“弄晴数点梨梢雨”（另一首“门前杨柳暗沙汀”已见辑本的《春词》组诗），《桂花二首》七绝，都不见于四库辑本。此外典籍中的谢逸诗文，自然更不在纂辑者的网罗之中。再如李彭《日涉园集》，《两宋名贤小集》卷一一五有《玉润小集》诗十二首，其中五首已见辑本《日涉园集》，余七首入辑本补遗，并加按语：“案此下七首据《玉润小集》补入。”实际上七首中的《唐明皇夜游图》，见今存残本《永乐大典》卷八八四四，明为纂辑者漏辑。于此可见四库馆臣于纂辑时各凭所见辑录，彼此互不联系，又缺乏一定章法，因此不能成为比较完整的某一家别集的辑本，这是它的主要缺陷。

其次四库辑本有错，如把韩维《南阳集》的诗误入赵湘《南阳集》；有漏，如前举《溪堂集》的《墨梅》二首之类。但这类问题多是小疵，即如近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据今存《永乐大典》残本对四库辑本作了大量补正，而《别集拾遗》依然仍有错漏一样，宜肯定其大端，不应苛求。真正关涉评价的，是四库馆臣的篡改和阉割。

关于篡改和阉割

这是《四库全书》最为学术界抨击诟病的问题。书中确实多

改字、改句、甚至删去整篇诗文的现象，就是在影印的文渊阁本上，挖改和删补的痕迹亦斑斑可见。但正因这挖改和删补的痕迹，说明这类粗暴删改发生在编纂的中后期，编纂伊始是相当忠实原本的。对于挖改，我们虽然见不到原本，但分辨影印本上不同字迹即能获知。这里举删补的事例。

苏舜钦《苏学士集》，据四库提要采用的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其本卷次、编序、文字和今存康熙间徐惇复刊本一致，而徐本卷六《送家静及第后赴官清水》与《静胜堂夏日呈王尉》两诗间，有七律《串夷》一首，全诗为：

区区黠虏敢狂呼，遣使峨冠谒上都。
辄出封章辞国命，妄传声势困军须。
闭之塞漠为良策，啖以民膏是失图。
淳俗易摇无自挠，每闻流议一长吁。

在四库本中，原此诗的地位易为《寄题周源家亭》，诗为：

君家有虚亭，跨涧复面山。
泉声碎环玦，清绕窗户间。
潜鳞俯自钓，嘉树坐可攀。
我思醉其上，与子开尘颜。
微吟对一枰，放此白日闲。

后诗在徐本中编为第四卷最末一首，而四库本卷四之末已不存此诗。这现象说明四库馆臣编定《苏学士集》时，完全忠实于底本，但后来发生了事故，不得不把《串夷》删除。而其时集子已经抄缮完成，改动少数文字可以采用挖补的办法处理，删去某篇而要不留下空白，势必牵动全卷甚至全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采取拆东补西的手段，这拙劣的手段，为今天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留下了线索。

由于《串夷》诗触犯时讳，删除后留下题一行，正文三行空白（四库本规格是每面八行，行二十一字）。而同卷末一首是长达

三十四韵的《悲二子联句》，与空白行数不相应，于是只能把卷四末一首行数相同的移补。这样表面上虽是弥缝了，却留下很大罅漏。因为《苏学士集》是分体编次的，第四卷是古诗，第六卷是律诗和联句，如今把一首五言古诗硬插在律诗中，细心的读者即使不核对他本，也能发现其间的不协调。

在四库的宋人别集中，类此改补情况并非仅见，其原因也并不是全部出于避讳。如《四部丛刊》本邵雍《击壤集》卷八有《思患吟》一首：

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
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

四库本把“夷狄犯中国”改为“所惠及人国”。而此诗于集中卷十六重出，四库馆臣因改避讳字时发现，于是删去十六卷中的重出诗，把同卷卷末倒三首字数相同的《答宁秀才》移补。可是《击壤集》中先后重出的诗不下十首，他处都仍保留原状，未移补，这说明必然是在检查夷狄等避讳字样才发现重复，才不得不动手术。总之，《四库全书》上存在的大量挖改和删补的现象，可以证明前人论定编纂《四库全书》的宗旨目的是蓄意篡改古籍，寓禁于征的观点，是武断的，并不符合实际。

今天需要探索的，是究于何时，出于什么原因，四库馆臣才开始进行挖改和删补。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和清代的文字狱连系考虑。清雍正时，文字狱猖獗一时。乾隆即位初期，曾有所缓和，但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再起狂澜，最有代表性的是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诗狱案。徐述夔原为江苏东台举人，已死。是年夏，其孙徐良田与本县监生蔡嘉树结仇，蔡首告徐私藏禁书，江苏布政使陶易不直蔡，判反坐。乾隆获知后亲自审阅案卷，居然在书中《咏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柱楼》“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发现大逆不道。以为前诗壶儿暗射胡儿，后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

本朝兴明朝之意。结果定案为徐述夔、徐怀祖父子开棺戮尸，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仆倒墓碑、追夺官职，藏书的徐良田，作跋的毛澄，校订的徐首发、沈成濯，江苏布政使陶易，幕友陆炎，东台知县徐跃龙，斩监候。其罗织的疯狂，令人不寒而栗。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纂修，中经文字狱的高潮。由于缺乏档案，纂修的经过今天只能从四库书本身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求索。在四库刻跋《学易集》提要中，曾提及所谓“圣训”，但乾隆究竟说了些什么，提要中并无一字透露，只写了馆臣奉行“圣训”的措施：

今恭承圣训，于刊刻时削去青词，以归雅正。其《同天节道场疏》、《管城县修狱道场疏》、《供给看经疏》、《北山塑像疏》、《灵泉修告疏》、《仁钦升坐疏》、《请崇宁长老疏》以及为其父母舅氏修斋诸疏，皆迹涉异端，与青词相类，亦概为削除。重加编次，厘为八卷，用昭鉴古斥邪之训，垂万世立言之准尔。

四库别集中收有青词的，不少概见，至于各类疏文，更是汗牛充栋。提要说乾隆因为《学易集》中收了迹涉异端的青词、疏文而震怒，简直不能令人相信；《学易集》提要不惜篇幅地列举篇名，更是欲盖弥彰。《学易集》原有二十卷，清初已散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掇拾排次，尚可得十之六七”，编为十二卷，最后根据“圣训”删定为八卷。究竟刪了些什么，在今存《永乐大典》残本中尚能找到迹象。

四库《学易集》卷三收有《使辽作十四首》，而在《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中却明题为“宋刘学易先生集虏中作十八首”，被阉割的四首是：

文物燕人士，衣冠汉典仪。

举知结絮好，深厌血毛非。

形势今犹古，规模夏变夷。

谁言无上策，会是有天时。

——其二

甘作河南犬，休为燕北人。
举能羞石晋，谁复怨嬴秦。
地扼辽东海，星占析木津。
悲伤此邦旧，会遣一朝新。

——其六

人物分多种，迁流不见经。
已无燕代色，但有犬羊腥。
海马难生驭，山苗煮始青。
舜韶方九奏，异类合来庭。

——其一二

闻有官军士，生存仍宦胡。
羞言陇西李，忍对杜陵苏。
椎髻心何似，环刀意岂无。
陈汤那复得，卫律不胜诛。

——其一八

这四首诗和苏舜钦的《串夷》一样，强调夷夏之辨，对清廷宣扬的“满汉一家”是莫大冲击，而且不是改动个别字句所能掩饰的，所以必须全部阉割。和《苏学士集》不同之处，是《学易集》已经重新抄缮，书上见不到改补的痕迹。这首诗除了阉割外，还将题目《房中作》改为《使辽作》，正文中改动的文字有“胡星”改作“边烽”，“毳幕”改作“沙幕”，“新罗骑”改作“东丹骑”，“虏历”改作“北历”，“更衣”改作“依身”等等，这和全书中他处挖改的文字一致。

可以想见，乾隆当年在徐述夔诗中对“壶儿”、“明朝（天）”尚且神经过敏，疑神疑鬼，见到《学易集》中忠实的收辑这类有关碍诗文，能不恼怒。这应该是“圣训”的真正内容。但纂改古

籍，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讳莫如深，只有暗中动手脚，因此提要也只能写得藏头露尾，吞吞吐吐。

《学易集》的“圣训”，必然在四库馆引发一场大地震。当事者被罚俸、降职以至贬官，恐怕是免不了的。而直接的结果是从此编纂者警惕此类文字，已抄定的集子尚且需要挖改、删补，正着手的集子更需及时动手术。大棍子在头顶飘舞，谁敢不小心翼翼。但是四库书的纂辑，看来并非以时代先后为序的，“圣训”事件发生在何时，一时难以考定，估计当在乾隆四十年以后。根据有关事实可以推知，《学易集》的发生，才是篡改之始，如果论定编纂的目的即为篡改，未免失之偏颇。

由于全书编纂者非一，遇到的问题又都十分复杂，而讳避的标准实际又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各个集子篡改的情况并不一致，某些集子中甚至连最触讳的“胡”“虏”字样亦仍存留在书上，所以绝对不应该一概而论。即以《学易集》而言，十八首《虏中作》并没有全部被阉割，仅删去了其中的四首。反映了某部分四库馆臣虽迫于功令，而仍以保存文献为重。我们应该体会到，绝大部分四库馆臣的动手篡改，是出于不得已，并非作为邀功取宠的手段，当然其中也未尝没有败类。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需要的是从此类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再也不要像类此愚蠢的事，而不宜对《四库全书》中的篡改现象，特别是对四库馆臣作过苛责难。

关于讹夺

多讹夺，是《四库全书》为人诟病的另一弊窦。造成的原因，一是编纂官改误，一是抄官鲁鱼，而后的错误要远远多于前者。

一般而言，四库的编写要求是相当忠实于所据底本的。如底本缺字、缺句或缺行，抄写时亦留相应空缺；底本原有的校或注，亦基本照录。但四库馆臣本身不加校，遇有底本上的错讹迳行改正。编纂一部如此庞大的丛书，原则上不加校记，实有其不得已

之处，对此亦不宜过多责难。

可是我国的绝大部分古籍，无论抄本或刊本，正如今天的大多数出版物一样，各类错误特别是明显错字，往往俯拾即是。即以《永乐大典》残本而言，错字之多亦颇惊人。四库辑本如果以忠实为名，以讹传讹，恐怕在当时就通不过。而改动的基本规律是：凡有改正，必有改误。公正的评价，应该视其改正多还是改误多而定。

笔者曾较细校核过近百种宋人别集中的诗篇，一般而言，四库编纂时改正多于改误，有的集子还附有审慎考订；抄缮的质量亦不一，但谨严的仍是占多数，个别集子基本上没有错字。当然其中也确有编纂、抄缮都草率、荒唐的集子，谢薖《竹友集》即为荒率的代表。

《竹友集》，四库所据是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其本编序、内容和今存《续古逸丛书》中的影宋本完全相同，比勘可知，四库改正宋本之误有二处：

- 一、《三益斋》“屣履见缝腋”，四库正“缝腋”为“逢掖”。
- 二、《求是斋》诗末注“黄鲁直为君此斋，并道其名斋之意”，四库正“为君此斋”为“为名此斋”。

四库延续宋本之误有二处：

一、《三益斋》“市骨捐千金，厩乘尽虎迹”。《汉书·礼乐志》：“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虎脊系喻良马，“虎迹”为误字。

二、《同董彦光陈妙音游安乐寺分韵二首》，正文误连作一首。

而四库改误、抄误却达数十处，下面亦各举一例：

改误例。《漫成》，宋本“时穿不借绕村行”，四库改作“时奇不惜绕村行”。改动者竟然不知不借是草鞋的别称，以为“穿”“借”是“奇”“惜”二字的形讹，因而作此妄改。

抄误例。《王坦夫静寄斋》，宋本“倘知定能应，子冠犹可

“纓”，四库作“倘知定能应，子冠定能纓”。编纂者不可能把上下句文字改成重复，可知下句“定能”二字是抄者冒上句而误。

四库《竹友集》中错误最严重的，是在《呈无逸兄》题后漏抄诗文及下一首《示舍弟》诗题，搞成文不对题。而《两宋名贤小集》中的《竹友集》编次亦同宋本，可证确系抄缮者抄漏。

造成某些集子讹夺多的原因，在于《四库全书》编校抄缮人员众多，其间学殖根底、认真态度不齐，即使事前有种种严密规定，在实行过程中也难以全部贯彻。集体奉命编书，不同于个人著述，许多必然会发生缺陷，往往无法克服，这不仅在古代，就是今天也如此。而况古籍整理工作十分繁复困难，要求达到完善，整理者需要学识，需要谨慎，需要时间，还需要资料趁手，否则必然鲁莽灭裂，问题丛生。这里不妨仍以《竹友集》为例作说明。

《竹友集》今存清人抄本，源出四库，有傅增湘氏校。傅氏未见宋本，亦未参考《两宋名贤小集》，因此对抄本存在的大量讹夺很少发现，所加校语亦多粗疏浅陋。失误较大的，如在《喜董之南归》诗题下加校：“董之南归有误”傅氏不知董之南是人名，把“南归”看作一词，因此怀疑有误文。如果集中此名仅见，尚情有可原，而此诗前有《次韵之南归房光诗有作》、《次韵董之南见赠》，此诗后有《以牛胆煎熟子送董之南》，可见傅氏并未细读本集，即率尔下笔。再如《闻无逸兄下第归》，傅校：“前有《哭无逸兄三首》，当在此首之后。”意思是有关谢逸生前的诗宜编在吊挽他的诗之前。而《竹友集》的编次是分体不是编年，且《闻无逸兄下第归》后尚有《次韵无逸兄见示》、《次汪信民寄无逸韵》等诗，这说明傅氏加校时连集子的编辑体例亦未尝留意。傅增湘是有名的校书家，其所校成果如是，足见整理古籍之不易。

今《竹友集》中还存在尚待考索的问题，如卷一《三益斋》又见《溪堂集》卷二；再如卷四《余赋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诗盛称此花之妙而汪迪彝赋梅花诗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数篇二花优劣未决